

编者按：为深入贯彻盐城市《关于积极应对疫情影响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的实施意见》精神，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六保”的迫切需要，加快培育消费新动能，不断满足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盐城市盐南高新区设立1000万元消费专项资金，举办首届盐南夜生活节，结合夜游、夜食、夜娱、夜秀、夜购、夜读等主题，打造属于盐南特色的消费立方体，聚力打造市区夜间消费核心区。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的构成也正朝多元化、现代化、文化性发展，夜间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式在我国各个城市中快速发展，并且在夜间经济的催化下，为传统餐饮、城市交通、文化旅游等行业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城市夜间经济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能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随着主要社会矛盾的转变，人们的需求变化需要各行业转变过往的经营模式和服务模式，满足消费者在精神上和文化上的需求。夜间经济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夜间经济能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的一座城市完全不同于日间的另一番服务和景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现代化程度和活力繁荣指数。夜间经济在各地备受关注，甚至被视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夜资源是自然给予人的馈赠，它蕴含着巨大的生产力，也是人类精神栖息的家园。在中国经济致力于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时期，夜间经济由于其蕴含的巨大的消费潜能、市场空间，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城市夜间经济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夜市，而是基于时段性划分的经济形态，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第二时空的进一步延伸，包含晚间购物、餐饮、娱乐、健身等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下，快节奏、压力大的白昼工作使人们需要更多的空间来放松身心、宣泄情绪、交流情感，个人收入的大幅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已不愿意被旧有的生活方式所束缚，夜间消费成为了商业都市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本期推出“城市夜间经济”专题，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了解目前我国各个城市夜间经济的基本形态和运作方式，分析如何通过科学规划、挖掘消费需求、创新服务、创新治理，高质量发展城市夜间经济。希望能为盐城市相关政府部门把握盐城的地域文脉与文化内涵，构建“立体化”的夜间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好盐城市的夜间经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思索和方向。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城市夜间经济

- 02 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 04 夜间经济：城市消费新蓝海
- 06 构建“立体化”的夜间经济发展模式
- 08 夜间经济激发城市治理新动能

全球大观

- 11 全球发展赤字与中国的治理实践

经济纵横

- 19 “十四五”时期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方向

悦读时光

- 封三 “史上最难毕业季”是成长的试炼

主 管：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黄兴港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盐城银河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0年7月28日

印 数：5800-6000

激活城市夜间经济， 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夜间文化旅游经济是夜间经济与文化旅游经济的结合，文化和旅游业是夜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与文化旅游经济相比，夜间文化旅游经济可以延长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停留时间，有利于刺激一个地方的文化旅游消费，有效提高夜间经济的层次和水平。夜间文化和旅游经济的发展，不仅给传统旅游资源带来了新的活力，还创造了新的旅游景点和文化旅游产品等，为人们提供差异化、多样化的夜生活，促进城市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一、夜间文旅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文化旅游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多样化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虽然国内游客数量逐年增加，主要公共文化场馆硬件设施逐年改善，但许多城市的夜间经济仍存在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当地人或外国游客的夜间消费仍停留在吃东西、看电影、乘游船等传统项目上。夜间消费对当地历史文化的开发深度不够，与当地文化环境的结合不够紧密，不能充分反映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带来的变化。

（一）受观念和消费习惯影响，市民夜间消费的积极性不高

一些年龄偏大的市民对夜间文娱活动有成见，认为“灯红酒绿”不是正经事；部分市民在消费观念上还存在重物质消费、轻文化消费的现象，导致了夜间文化娱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缓慢，缺乏强劲的内在动力。另外，消费习惯也制约“夜间经济”繁荣发展。工作压力大、收入水平低和生活支出高等因素确实制约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夜间消费行为，市民尚未形成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那样固定的夜间消费习惯，应该说既有缺乏夜生活习惯的主观原因，还有缺乏吸引市民夜生活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

（二）业态模式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

国内“夜间经济”发达的城市，都会推出风格各异



的旅游活动项目来吸引游人，如南京夜游秦淮河在游船内设立各项不同的娱乐节目供游人欣赏，杭州《印象·西湖》的大型演艺节目形成了强大的品牌效应。当前很多城市的夜间活动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夜市相似度极高，食物简陋、品牌单一、缺少特色，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打造出有品位、有特色的高质量夜间文娱产业。中国旅游报文章《我国夜间经济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一文指出，我国夜间经济产品仅限于餐饮、购物、邮轮、灯展等，文化、体育、竞赛、演出、保健等产品极为稀缺，业态单一。发展商业夜游、主题公园夜游、表演夜游、娱乐夜游、水秀、庙会、灯光秀、特色夜游、体育夜游等游客参与度和主体性迫在眉睫，天文学夜游和特色摄影夜市经济业务具有较强的经验和学习能力。90后、00后已成为夜经济的主要消费群体，传统的促销方式难以奏效，因此夜经济需要营销创新。

（三）缺乏长远规划，未形成成熟、健全的多部门联动机制

“夜间经济”发展若完全依靠市场自由发展，难免出现自发性和盲目性的特征，如不合理引导，“夜间经济”发展难以形成规模化、品牌化集中发展的样貌。例如，今天的北京三里屯酒吧街之所以成为北京夜生活最“繁华”的娱乐街之一，是与其政府科学规划、合理引导，多部门分工协作分不开的。早期的三里屯夜晚经营活动单一，周边环境缺乏特色，提高其品质的条件有限，

逊色于后海、工体这样一些以环境取胜或者以配套服务取胜的场所。考虑到三里屯紧邻各国使领馆，适于发展酒吧经济，北京市政府联合多部门对三里屯地区的街道进行了统一规划和改造工作。在其西侧增加近5.2万平方米的新酒吧活动区域，在周边发展旅馆、商场、餐饮、居住等功能，增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等公共服务设施。通过一系列的规划改造，如今的三里屯酒吧街已成为集商业休闲、商务办公、居住教育为一体的经济发展区域，成为中国城市“夜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

二、激活夜间经济，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发展夜间经济与推动文旅融合是两项紧密相关的工作，一方的掣肘会直接影响另一方的成效。发展夜间经济尤其要关注文化消费，要把丰富的文旅产品在民众休闲放松的重要时段摆出来，进一步刷出存在感，助力社会经济发展。

（一）注重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因地制宜编制夜间经济实施方案

夜间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精心谋划，全方位推进。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都注重顶层设计，政府部门能够把握好引导方向，制定严谨的“夜间经济”发展政策和规划，加大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程度，确保各项政策实事求是，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群众选择，同时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在氛围营造和公共设施方面加大投入，交通、卫生、城管等部门各司其职，加强指导和监管。

要结合各地的发展条件和文化特性，按照时间序列和空间布局，对区位、产业、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等进行综合评估，系统、科学规划城市功能区，因地制宜编制夜间经济实施方案。不仅要顺应市场需求，而且政府要合理引导，加强经营管理和实施监督，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文资源，对经营产品的规划审批、经营管理、安全卫生等进行全面规范，推动形成功能完善、布局合理、结构优化、业态多元、井然有序的夜间营商环境。

（二）建立夜间经济发展协调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上海市黄浦区任命了“夜间区长”和首批具有夜间经济相关行业管理经验的“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北京市设立了市、区、街（乡镇）三级夜间经济“掌灯人”制度，统筹协调夜间经济发展。部分地区成立了夜间经济委员会，聘请具有相关行业管理经验的人员、夜间经济商户代表等，协助“夜间区长”工作。同时成立夜间经济商会组织，加强自律规范、促进市场繁荣，形成政

府引导、市场发力、专业运作、多方联动的夜间经济发展协调机制。各地针对“夜间经济”发展制定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包括对商场延时营业、文化旅游服务机构延时营业、公交车延时运营，开展夜间打折促销，举办夜间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等活动给予一定的补贴。

要政府成立“夜间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夜间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安排市级财政部门专项资金扶持夜间经济发展，区级财政配套安排相应规模的扶持资金，重点加大对夜间经济经营企业因延长营业时间增加的水、电、人工等成本费用的补贴力度。支持运营商集中结算、统一核算，对纳入统计部门线上统计的给予一定资金扶持。为美化街景设置的公共照明和装饰照明设施等非经营性用电可接入市公共配电网，相关费用由各级财政承担。

（三）丰富夜间经济消费业态，打造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夜间经济产品不仅仅是游船和灯光，而且涵盖了表演、康养、文化和体育类产品。根据游客的多样化需求，要进一步创新服务业态，注重产品体验，融入生活和文化体验场景，加入沉浸式的休闲互动，提升科技含量和文化内涵，开发参与性、体验性和学习性强的产品，推出更加多样的服务，促进夜间产品多元化发展。

要高起点规划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夜间经济集聚区和商务区，加快构建集食品、旅游、购物、娱乐、体育、会展、演出为一体的夜间经济业态。鼓励重点地区、商场、超市、便利店延长营业时间，积极推进夜市产品多样化，发展“夜市经济区”。在老城区、历史街区或居民较少的独立区域，城市夜景设施齐全，引进歌剧院、剧院、博物馆、美术馆、商业画廊、电影院、酒吧、餐厅等业态，形成相对独立的商业生态。在河畔、湖畔、海滨、运河开发水秀、主题光影秀、声光电大型演出等夜游项目，丰富文化、体育、竞赛、演出、保健等产品，形成夜间经济集群。推广“夜游”主题观光活动、“夜娱”文化体验活动、“夜食”特色餐饮活动、“夜购”时尚消费活动。

（四）注重挖掘历史与文化资源，植根地方文化发展夜间经济

“夜经济”发展不仅仅停留在购物餐饮、打折促销、延长营业时间，而应该紧密结合城市历史和文化内涵。南京夫子庙步行街结合“夜游秦淮河”等旅游资源，深入挖掘作为六朝古都的历史文化内涵，使市民和游客欣赏美景的同时受到历史文化的滋养；杭州市围绕西湖文化景区，开发《印象西湖》大型灯光实景表演、宋城千古情

夜间经济：城市消费新蓝海

近年来，夜间经济的发展成为我国多个城市的重要话题，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也将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作为其中的主要内容，明确了发展夜间经济、打造夜间消费场景和集聚区的重点任务。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南京等城市更是相继出台了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具体举措，力图开启夜间经济这一消费领域的新蓝海。



夜间经济再次崛起的时代背景

夜间经济的活跃度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活力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对夜间经济的重视也由来已久，早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曾经提出过发展“国营夜市”的目标。近期夜间经济再次成为各地区的关注点，与其重要的经济地位是密不可分的，并具有新的时代意义。

人民生活水平、多元化消费需求不断提升的结果。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民经济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迅速增长。194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名义增长566.6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9.2倍，年均实际增长6.1%。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带动了消费能力的提升，也增强了对餐饮、零售、娱乐等服务业的需求。夜间消费是人们工作之余的重要休闲方式，而且消费方式日趋多元，除传统的餐饮、娱乐和购物外，对体育、旅游、康养以及演艺、教育等文化消费等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因而，夜间经济的再次崛起是对人民多层次、个性化、高质量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回应。

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推动新型消费方式发展的结果。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外卖、网购等线上消费得以蓬勃发展。同时，网上消费

等夜间商业文化项目，展现城市历史文化脉络，突显文化厚重而又开放包容的城市形象。苏州以夜游园林、夜赏评弹为特色，使山塘街、平江路等商业街区成为集中展示江南文化和水乡文化的平台。这些城市发展“夜经济”是在历史街区、活动空间和传统习惯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文化娱乐、运动比赛、展览展示活动，将实体经济实现了向城市特色文化的靠拢，并依托深厚和独特的城市文化打造了自己的“夜经济”品牌。

要充分利用城市地域文化基因和人文特色资源，结合当地生产、生活、生态特色创新创意，提供差异化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服务，避免游客审美视觉疲劳，不断满足大众旅游休闲的市场需求。夜间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城市文化传承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博物馆和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依托城市历史文脉等

地方文化打造夜间经济特色。深入挖掘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探寻民风民俗的发展沿革，深层次挖掘其特色内涵，多方位演绎其表现形式，将夜间经济与现代城市文化深度融合，不断创新旅游服务内容和经营方式，开发出独具特色的城市夜间旅游产品，凸显城市靓丽品牌，彰显城市鲜明特色。

三、完善公共设施与服务，平衡城市安全与活力

通过梳理各省市发展“夜经济”的相关政策发现，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建以促进“夜间经济”发展是各省市共识。政府要在交通运输、城市灯光亮化、水电气供给、5G网络项目、污水收集排放、垃圾分类处理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调动社会各方资源参与“夜间经济”发展，同时加强安全、卫生、质检、消防等方面的监管，营造“夜间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2020年2期 丝路视野）

使其逐渐成为夜间消费的主要形式。《2019 中国移动互联网夜间经济报告》显示,从夜间经济的行业类别来看,夜间用户在即时通讯、在线视频、综合电商行业的活跃渗透率最高。与此同时,更多的实体店铺开始借助网络的力量,促进线上和线下交易的同步发展。阿里巴巴《“夜经济”报告》显示,23 点到 24 点,仍有超过 83% 的口碑餐饮商户在营业,24 点之后仍在营业的口碑商户比例超过 60%,借助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外卖业务是这些商户经营至深夜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借助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城市的交通保障、安全保卫、市政管理、应急救援等公共服务能力也大大提高,为夜间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

应对中国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新途径。近些年,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国内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多种发展矛盾叠加的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已经十分迫切。夜间经济巨大的发展空间被一些学者称为“消费领域的新蓝海”。夜间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消费水平、增加社会就业、带动城市发展,而且能够促进和激发新的经济业态、加快城市风貌改善、繁荣城市文化,提高城市的对外吸引力和整体竞争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夜间经济成为很多城市新一轮竞相发展的重点。

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加快夜间经济的发展,需要立足经济规律,从影响夜间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入手,加强规划引领和统筹谋划,为夜间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立足传统商圈,激发市场活力。纵观各地情况可发现,每一个地区夜间经济规模的扩张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市场规律作用下人群自然集聚的结果,如果仅仅依靠政策推动可能只会导致一时的繁荣或者景观的亮化,却难以维持长期的繁荣态势。因此,促进夜间经济的发展必须将尊重市场规律、激发市场活力放在首位。要立足于传统商圈的建设,一方面将已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夜间经济集聚区作为发展的重点,促进业态升级和品质提升,进一步强化其景观的设计、亮化,以及配套设施的完善,提高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推进夜间经济与日间经济的融合发展,通过对日间经济商圈延长营业时间、完善夜间消费业态等方式,推动日间经济向夜间经济延伸。

增强文化内涵,满足多元消费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夜间经济的消费需求也呈现多元化的特征。除餐饮、购物、电影、KTV 等传统消费领域外,人们对更具个性和品质、更具地方特色、更具文化气息消

费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强。在一项网络调查中,88.9%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在夜间开放的话他们会去。北京、成都、广州、苏州等城市夜间经济的繁荣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地独具魅力的文化特色。对此,在发展夜间经济的过程中,要积极挖掘各地夜间经济的文化特色,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夜间文化项目,提高辨识度、吸引力和影响力。要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产品,发展演艺、夜游、培训、会展、康养等夜间项目,加大对夜间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满足人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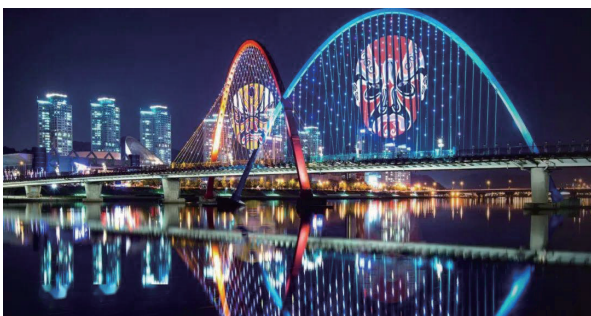
强化科技引领,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发展。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助力夜间经济快速发展。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推动下,夜间经济的发展将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宽广的发展空间。要注重运用信息技术拓展夜间经济的发展空间,对夜间线上消费的发展给予与线下消费同样的重视,注重培育信息技术推动下夜间经济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采取宽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引导其健康发展。借助 AR 或 VR 技术,发展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打造多维度的场景环境,提高消费者的体验效果。促进线上与线下交易的互动发展。

加强系统规划,促进多部门联动发展。夜间经济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发展,从目前各地区夜间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加强夜间经济的系统规划十分重要。杭州市早在 2010 年就启动了“夜杭州”品牌建设系列工程,整合餐饮、购物、旅游、住宿、旅游产品制造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共同推进“夜杭州”的建设。成都为加快夜间经济的发展,将 10 个夜间旅游景点、10 处夜间视听剧苑等 100 个夜间经济示范点位作为精心打造的重点,塑造出一批夜间旅游、视听、文鉴、亲子、医美、乐动、学习、购物、餐饮和风情街区的消费场景,促进了多领域、多部门、多行业的一体化协同发展。以夜间经济的建设为突破口,形成共同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

加强城市治理,完善基础设施与服务。除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文化习俗等影响因素外,夜间经济的发展还会受到气候、交通、城市监管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其发展对配套设施、城市交通以及治理体系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城市要尽可能为夜间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优化公交出行线路、延长地铁营运时间、保障停车方便,借助互联网技术提高交通智能化、精准化程度,方便市民出行。城市管理对于夜间经济的经营要适当包容,避免教条、“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要运用市场手段引导夜间经济规范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水平,加大对假冒伪劣以及食品安全问题的处罚力度,促进夜间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2019 年 23 期 群众)

构建“立体化” 的夜间经济发展模式

作为现代城市形态之一，夜间经济是一种基于时间周期的经济模式。而所谓的“立体化”夜间经济就是把夜间经济规范化、品牌化、人性化之后的形态。打造“立体化”夜间经济，要在充分利用日间经济奠定的物质基础框架及规范模式的前提下，做到突破框架，从而走出独特的发展思路。



运用已有体系营造规范化的夜间经济新世界

夜间经济的热点往往布局在大城市，而这些城市往往已有完善的日间交通体系。因此，可把一些在日间串联夜间经济热点的主要交通资源抽离出来进行调整，打造夜间经济专属的“交通动脉”。例如四川成都宽窄巷子、锦里古街、九眼桥酒吧街等景点于日间已有“熊猫巴士”旅游专线串联，若在夜间把该专线加以整合，专为夜间客流量大的景点所用，不仅可使客流量得到保证，还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便利化的出行选择。

日间交通、卫生、治安等方面已有完善监督体系的地区，则可在夜间经济发展时把这些体系整合一体化。各监管部门继续各司其职，不能因为到了夜间就松懈。例如成立夜间执法专组、完善夜巡制度，也可令各部门留有一定数量的24小时值班人员，随时待命以应对夜间突发事件。还可以发动群众力量，利用微信、电话专线等设立公众平台，鼓励群众举报违反夜间经济运行规则

的行为。事实上，微信已有举报占用私人车位并寻找车主移走车辆的服务，可参照此类服务进一步完善检举平台。

规范化还要体现在打造“环境友好战略布局”夜间经济。具体而言，针对经营者，提高环保准入门槛，对经营配置符合环保规范的企业予以经营准许，并在发现违反相关环保规定的企业后保证执法惩处力度；针对消费者，采取刚柔并济的措施，条例规定与劝教双管齐下；针对规划者，应该在规划上就考虑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尽量在选址上降低生态负荷，设计上实现环境友好，配套设施上达到自净减排。例如，法国里昂最大的城市盛会之一灯光节已经开始注重选择光污染少，符合环境标准的灯饰。又如上海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垃圾分类”政策，并在人流量大的地方加强监管惩处力度。

除了政策引导，还需要提升民众的环保意识及自觉性，实现夜间经济“共享共筹共建”的发展模式。香港的电视节目里经常会播报充满艺术感及召唤感的公益广告，鼓励群众为社区服务。同时，香港从幼儿园起便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志愿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以动员更多社会人士。这种整体素质的提升需要时间积累，但若能够越早唤醒群众的意识，收效便会越快越多。

深挖创新，实现夜间经济品牌化

深挖夜间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从时空上突破限制，结合市场需要及地理位置优势，逐渐延长运营时间、拓展空间分布，打造“24小时商圈”。“24小时商圈”是由一个个私有的小企业构成的，政府可对这些“小细胞”加以鼓励支持，在配套设施上支持其“24小时运营”的可能性，在宣传上统一营造商圈的魅力以保证24小时持续的客流量，进而延长商圈运营时间。在空间上，可为夜间经济发展规划出更多的专用地，降低行业进入壁垒，让更多小企业参与其中，形成外部效应——集聚与收益

乘数增长。日本有很多 24 小时的温泉酒店，游客在享受了温泉的滋养后还会有很多后续消费，如购物、娱乐、饮食等，将上述消费点整合打包，便成功打造出围绕温泉这一核心的颇具特色的一体化 24 小时商圈。现今年轻人中非常流行角色扮演侦探破案、密室逃脱等游戏；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现出对文艺清新风格事物的追寻。因此可迎合夜间经济消费主力军年轻人的需求，开设 24 小时游戏室、24 小时图书馆、24 小时博物馆等。

夜间经济发展因竞争激烈，互相效仿挤压的现象会愈来愈明显，要想从中“走出来”，就要不断地推陈出新，不断地以新模式经营运行。当然，打破已有传统基础去做出新鲜尝试是大胆的、会面临一定风险，但这却有高弹性的市场发展机遇。

英国约克郡有“幽灵漫步”的怪异旅行线路，让人既惊吓又惊喜，这种经营模式不仅让游客有机会去体验城市夜晚的风光，也让游客能深入了解当地的传说、文化故事等。而上海这一充满文化气质的城市也可参照这种经营方式，结合其特有的海派文化、民国风情等设立特色线路，配合特色古建筑街道上表演者进行的 24 小时演绎，通过这种“新”、“怪”的方式使游客能切身地了解上海的历史并体验这个地方的无穷魅力。

品牌化后的夜间经济产品将在消费者之间形成推广与传播的路径，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力量。例如香港兰桂坊的异域风情、时髦的格调，使其从众多酒吧街中脱颖而出，游客享受在其消费时的身份品味象征与视觉享受。再如韩国民俗村在夏季会以“灯会”的形式延长运营时间，不少游客为了切身感受韩国的传统文化之美，慕名而来。这两个例子，都是充分把握利用其特色后形成了夜间经济的品牌。

人性化缔造更舒适的夜间经济

夜间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服务业挂钩，因此我

们还需要更多关注人性化这一需求，否则仅靠规范化管理的引导容易制约夜间经济的发展。要做到人性化，就要对接各个层次客户群体的人性需求，具体针对各个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去进行完善。例如，上海黄浦区推出“夜间区长”、“夜生活首席执行官”以统筹协调夜间经济发展，为适应多方面多层次的服务需求提供一个有机整体，并保证在规则内尽量人性化，不要限制夜间经济的发展。

例如，要想做到既满足年轻群体在酒吧一条街的消费需求，又不能纵容酒驾醉驾等严重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可以在酒吧街旁增设出租车、代驾等人性化服务，同时注意规范体系运营，以避免乱停乱放的现象发生。又如，消费群体的夜间出行若单单依赖地铁则太耗费财力物力，为便利化夜间出行可以考虑在各个夜间经济活动点之间设置电动车租借服务，同时兼顾好信用、合理停放等规则问题。

为使得夜间经济在符合规则的范围内变得更舒适，可以考虑国际性的人性化——考虑国际消费者的生活习惯，配备更多人性化的公共设施。例如，夜间商圈里设置更多洁净的座厕、母婴室、自动感应酒精消毒液等在国外常见的公共设施，同时在夜间经济点实现多语言化（如扫码翻译等）、货币兑换简捷化等等。

总之，要实现人性化就要充分考虑各个消费群体在夜间经济活动中方方面面的细致需求，并以一种最快速有效的方式使得消费者能享用到这种服务，同时不能破坏规则。当前，高质量的夜间经济增长受到各大城市重视，“夜动力”是拉动新一轮消费升级的重要“马车”。各大成熟的或新生的夜间经济热点区域正举起一把把“夜间火把”，坚持规范化、品牌化、人性化发展，才能激发夜间经济的新一轮高质量增长。

（2020-1-31 文汇报）

（上接第 18 页）

作发展经验交流，包括“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形式多样的论坛交流活动。以“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为例，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固定化交流机制，通过与会国家发展经验的交流分享，提升沿线国家发展的持续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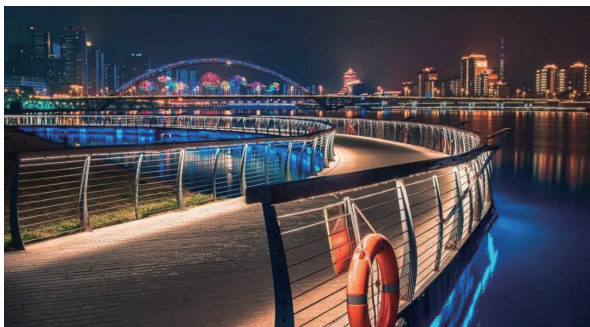
第三，在具体领域共享发展经验。中国“不输出”发展模式，而是积极与世界各国共享解决发展难题的中国经验。一是分享精准扶贫减贫领域经验，包括成立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和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举办中国扶贫国际论坛等。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为例，通过建立国际减

贫培训体系、国际减贫交流活动，已经为来自 100 多个国家的 4000 多名减贫工作者提供培训，为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贫困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二是交流环保领域经验，包括成立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举办中国环博会等。以第 20 届中国环博会为例，共有 25 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参会展商达 2047 家，为世界环境保护提供了中国经验。三是共享反腐领域经验，中国通过设立 G20 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深化反腐执法合作网络、发表《北京反腐败宣言》，与世界共享中国反腐经验。

（2020 年 4 期 国际问题研究）

夜间经济激发 城市治理新动能

夜，是人生命过程中的一部分，远古的人们对夜有着许多神秘虚幻的遐想、浪漫柔美的追求、博大深邃的思考。昼夜，显现的一阳一阴、一明一暗、一实一虚，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一张一弛、一作一息、一动一静，彰显了自然的哲学、节律，透露了大自然的秘密和力量。夜，与人的生命活动紧密相连，特别是与当今的高品质生活联系在一起，自然就会形成丰富多彩的产业服务系统，夜间经济应运而生。



夜间经济作为学术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是英国学者针对夜晚城市中心空巢现象的改善所提出的经济学名词。2001年英国学者保罗·查特顿和罗伯特·霍兰德以“城市夜间休闲规划”的概念首次提出夜间经济。在我国，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在2008年奥运会前后，经济学界开始加大对夜间经济的关注。一般而言，夜间经济指从当日下午6点到次日凌晨6点所发生的，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活动在白昼以外（夜）时空的进一步延伸，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夜市，还有一种基于“高质量分享”能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的一座城市完全不同于日间的另一番服务和景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现代化程度和活力繁荣指数。近年来，夜间经济在各地备受关注，甚至被视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夜间经济：从“黑暗”走向光明

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晚间的购物、休闲、娱乐貌似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开始为大家所热衷，然而，夜间经济并不是舶来品，更不是一个新名词。“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唐朝人方德元在《金陵记》中就记载了金陵的夜市：“富人贾三折夜方囊盛金钱于腰间，微行夜中买酒，呼秦女，置宴。”明朝人田汝成在所著的《西湖游览志余》中称赞宋代临安夜市：“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阗达旦。”他还称夜市秩序很好：“篝灯交易，识辨银钱真伪，纤毫莫欺。”古诗词情境交融地描绘出一派繁荣的夜市景象。虽然当时的夜间经济比较单一，仅仅局限于夜宵、娱乐等，但也勾勒出夜间经济最原始的画面。如今，夜间经济的形式更加丰富，餐饮、购物、旅游、金融、文化娱乐、休闲养生，从酒吧集聚的商业区域到夜游博物馆、从“动物园奇妙夜”到“夜宿海洋馆”等夜间休闲活动，多元化的消费市场已经形成，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与消费习惯，人们开始追求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迎来了新一轮的消费热潮。与此同时，精神消费、文化消费、健康消费、智能化消费需求更为旺盛，消费者开始在能力范围内追求更精致、更内涵、更丰富与更便捷的生活方式。城市化率越高，消费需求就越多元化，消费时间就越长。繁荣夜间经济意义重大，不仅能拉长经济活动时间，提高城市设施的综合利用率，提供相应增量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也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普通的休闲活动有了“夜”的加持，也就多了一分朦胧和遐想，加之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夜晚大脑活动“情绪中枢”作用占上风，更容易受到情绪支配，因此，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夜晚就显得格外迷人。面对璀璨闪耀的浪漫夜景、街头巷尾的美食餐厅、深夜不打烊的夜市……“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诗情画意就不难理解了，结束了一天理性高效工作的城

市人更愿意将充沛的感情注入此刻的休闲。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们的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夜间经济在新一轮消费升级浪潮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夜间经济业态创新能促进供给端的服务创新、产业结构创新和产品品质提升，也能让城市更加浪漫与梦幻。高端服务业是方向也是必然，夜间经济将引导产业向高端价值链不断转移，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据资料显示，在美国，土地面积、时间中分别有三分之一的空间是用于休闲的，而夜间占据了60%以上；2017年英国夜间经济成为第五大产业，创造的GDP占其全国总量的6%，伦敦的夜间经济更是提供了约占全国八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夜间经济所蕴含的生产力得以进一步挖掘发挥。据统计，在北上广深等前线城市，夜间消费的比重占到了全天消费的60%左右，北京王府井超过100万人的高峰客流是在夜市，重庆2/3以上的餐饮营业额发生在夜间。

发展夜间经济是迎合时代潮流的战略决策，上海、北京、天津、河北、杭州、南京、西安等地均出台了发展夜间经济的相关政策，“夜间经济点亮行动”“打造不夜城”“月光经济”等字眼开始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夜间经济在新一轮消费潜力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过程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发达城市是夜间经济的主体和先锋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城市结束了白日的繁忙，开启了它的另一面生活，既有灯火通明、歌舞酒绿、友朋聚会，也有万籁俱寂、典雅幽静、冷月银河、皎洁月色、花前月下、清风朗月，夜生活、夜景的背后昭示的是城市经济社会发达程度。学术界曾利用NASA夜间灯光数据与GDP建立相关关系来研究城市的发达程度——较强的夜间灯光代表更高的城市发展程度。

交通是城市活力的直接体现，借助“滴滴出行”的出行数据，辅之以“饿了么”大数据平台夜宵外卖订单数据，从夜间出行与餐饮两个视角来描述我国城市夜间经济的发展态势。如表1所示，夜间出行占比最高的十大城市与夜宵时段订单交易额最高的前十大城市绝大多数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如果将夜间出行与夜间宵夜订单作为反映夜间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替代，那么夜间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城市经济发展程度是一致的。

发达城市是夜间经济的先锋。发达城市面临更大的夜间消费需求，生活在发达城市的人们具有收入高与压力大并存的生活状态，对于他们来说，丰富的夜间休闲方式是他们释放压力、追求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同时

发达城市具备更强的发展创新夜间经济能力：一方面具备产业体系完善、具备更先进的服务业形态，另一方面完备的亮化工程、环境改造、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等均可以为夜间经济发展助力。发展夜间经济是趋势，也是新形势下的必然，发达城市作为先锋，探索创新夜间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为其他城市所借鉴，最终夜间经济也将“点亮”中小城市、相对欠发达城市的夜晚。

珍惜夜资源，创新开发夜资源

资源是发展的物质基础，现实生产力和现代产业体系均是建立在相应的资源基础上的。夜资源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宝贵财富。夜，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资源，只是以前我们并未上升到资源这个高度去认识它。夜资源与我们熟悉的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等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可以作为扩大产业所依赖的根基。新时代呼唤新的资源观，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人们认识、利用资源与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在加大供给侧改革的大潮下，我们更应充分认识、开发利用夜资源，发展夜间经济，创新需求、创新服务，促进消费升级，以激发生产力潜能。

一是人的修养生息、劳动力的持续依赖夜资源。夜，从其自然功能作用看，是极其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日落而息，是劳作一天的人们休息养生、恢复体力、振奋精力的必要自然过程，正是有了夜，人们才能阴阳互补、动静调剂、舒展放松、休息养生、恬静悠闲、静思冥想、探究宇宙、构筑未来。可以说，人的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夜间度过的，夜间生活的质量决定着白昼的工作和学习质量和效率，夜间的愉悦和幸福决定着人生的质量。如果颠倒黑白，长期逆行，将难免积劳成疾，折损健康和寿命。修身养性（包括养心、养生、养颜）、养精蓄锐、健康身体、健康中国，离不了黑夜的馈赠。

随着现代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尤其在大城市，人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工作，一顿美食、一场电影、一次夜游、一次畅谈，都会给城市人疲惫的身心带来慰藉。夜间休闲是城市人的“充电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幸福感的来源，这是城市人可以精力充沛、有创造性地投入第二天工作的关键。

二是夜资源是灵感的源泉，诞生了伟大的艺术品与精神产品。夜是我们生命离不开的重要部分，夜是我们精神世界成长、历练、回味、丰富所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过程（阶段）。伴随着休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可以静思，展开想象的翅膀，遨游于未知、梦幻、理想的世界，这是进行升华、升腾、构建和创新活动佳期。

对于很多人，比如说艺术家、作家，夜是创作对象，更是灵感源泉。月亮与星星交相辉映的深蓝色夜空下，诞生有梵高《星空》的伟大创作，也有“天阶月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唯美诗句，更有文艺青年利用手中的镜头，运用“光绘摄影”技术，在夜晚的黑暗中以光为画拍摄出一幅幅令人惊叹的照片，极富创意、表达非凡——夜资源带来的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创新，夜资源带来了伟大的艺术品与精神产品。

三是夜资源与经济形态相融合，带来服务产品创新与产业升级。夜间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是夜资源与服务产业的融合，由于夜资源的融入，带来了服务产品的创新与服务产业的不断升级。我国的夜间经济经历了由单一化经营到多元化发展的过程。最初，夜间经济是餐饮、购物等消费活动由白天向夜晚的延伸，通过增加营业时间来实现流量增加，北京的簋街、成都的锦里、宽窄巷子等就是夜间经济在这一阶段的代表；随后，夜间经济业态逐渐丰富，开始出现酒吧、夜总会、舞厅等以夜晚营业为主的服务行业，比如香港兰桂坊一直是香港标志性旅游项目，北京的三里屯、后海、朝阳公园、工体、南锣鼓巷等商圈汇聚了大部分的酒吧，成为夜间经济的标签。随着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夜间旅游、演艺体验等新业态开始出现并走向成熟，南京的“夜泊秦淮”、桂林的“夜游两江”等均是依托于灯光夜景的夜间游船项目；珠海的情侣大道更是经年吸引各色男女蜂拥而至，成为一道风景线，看似并未直接产生消费，但是拉动游客流量，间接增加了城市收入；夜游博物馆、“动物园奇妙夜”夏令营等项目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随着夜间经济的不断发展，夜间经济业态不断创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市人对于精神需求的日益提高，结合消费者年轻化、重内涵、具有猎奇心理与冒险心理的特点，夜间经济产品创新将迎来活跃期——比如在荷兰埃因霍恩，在梵高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附近，新派设计师 Daan 设计了世界上第一条夜光自行车道，附着在道路上的特殊发光材料在白天靠日光充电，夜晚就化作星光之路，脚下是梵高的幻想世界。创新精神产品、增强体验感与参与感的服务对于发展夜间经济来说尤为重要。

激发夜间经济活力，打造特色“夜来香”

在推崇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新时代，城市经济发展更需要依靠特色——根植性的力量形成竞争力。自然资源禀赋是城市特色最原始的部分，自然景观、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塑造了城市发展的底色；价值、信仰、民俗风情、人文精神、文化传承是一个城市的内在和修养，

更是城市发展的潜力和生命力的来源。缺乏深刻的自我审视、盲目跟风后果不仅仅是浪费资源，更是走了发展弯路，错失发展良机。

伦敦夜间经济以“酒吧经济”闻名，是其夜间经济的主要形式，但并不影响伦敦的夜生活散发着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气息——《歌剧魅影》《悲惨世界》的戏剧也同样演绎着伦敦夜间经济的繁华。在法国，将地域文脉注入夜间经济的还有一个典型的城市——里昂，作为世界三大灯光节之一的举办地，更是将城市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城市理念运用光影技术投射到城市特色建筑上，真正用地域文脉点亮城市。夜景文旅灯光的价值可分为政治、社会及经济上的价值。从收益来源来说，价值可分成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从里昂灯光节的收益来源看应是间接收益大于直接收益，每个节点的灯光表演政府并不直接收取门票费用，反而需要投入大量的安保支出。政府的间接收益主要来源于住宿、餐饮、交通及所有相关行业的税收。

世界范围内发展夜间经济已成为城市实现经济复兴、展现文化底蕴的新引擎，相比伦敦、巴黎、里昂等城市，我国城市发展夜间经济最大的障碍在于产品结构单一、盲目跟风以及缺少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我国夜间经济产品类型，大多局限于餐饮、购物、游船、灯光秀等，文化、演艺、康养类的产品仍然非常少。各地发展夜间经济业态同质化问题严重，存在盲目的跟风、模式雷同等现象，如深圳灯光秀、西安灯光秀、天津灯光秀、重庆灯光秀等全国各地都在举办灯光节，夜景照明空前繁荣；秦淮游船、桂林游船、重庆两江夜游、黄浦江夜游，夜游珠江，江河沿江城市夜间游船蓬勃开展；每个城市都存在的“酒吧一条街”，繁荣背后是成功模式的复制，且不论盲目跟风所造成的交通安全、环境安全、食品安全、光污染、噪音污染等问题，我国夜间经济发展模式更是缺少了特色和情怀的融入，缺少了基于本地特色根植性的夜间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中国有着五千年的灿烂历史文明，是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广阔国土、民族众多决定了我国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地域特色鲜明的具有厚重感的国度，我们有充分的条件克服当前的障碍、发展具有文化底蕴与地方特色的城市夜间经济，更是可以将民族文化中神秘、梦幻的因素运用到产品、产业创新当中，让中国城市的夜间经济更有新意，也更浪漫、更梦幻。

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治理的双重作用，是唤醒夜间经济的关键

发展夜间经济，最根本的是运用市场手段开发夜间

全球发展赤字 与中国的治理实践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内问题的全球化效应不断强化，全球发展赤字治理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日益紧迫的核心议题。深入剖析全球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阐释全球发展赤字的表现、成因和中国治理实践，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对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产品与服务。夜间经济的背后支撑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消费升级，而作为夜间经济消费主体的年轻人，更是崇尚自由、品质、多样化的消费方式。因此，供给端发力创新服务、创新业态，迎合且引领群众消费方向的产业是发展夜间经济的关键。比如当前比较热门的夜间旅游，虽然仍存在供给不足、供需不匹配等问题，但这是发展夜间经济产业的有益尝试。广西桂林的《印象·刘三姐》、陕西的《长恨歌》、杭州的《宋城千古情》等优秀的文化演艺项目，已经成为成熟运用并与表演相结合的夜游产品，不仅在集聚人气上发挥着作用，也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收益。此外，还有别出心裁的个性化民宿。如山间田野的帐篷、洞穴海边的太空舱等以新奇的住宿环境吸引游客的方式，也成为“点亮”夜间经济、培育新消费增长点、撬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可靠路径。实际上，我国发展夜间经济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以餐饮、购物、夜游等为主要形式的产业形式已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康养、文化等消费存在的市场缺口也日渐成为夜间经济不可忽视的方面。关注精神需求、创新夜间经济业态、服务与产品，是我国城市进一步发展夜间经济的突破口。

政府作为一只有形之手，对于发展夜间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政府作用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设施、服务以及消除夜间经济消极影响上，改善夜间照明、提高晚间

公共交通便利性、财政补贴朝阳产业、加强业务许可，同时加强监管力度、治安管理等方面，并完善食品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为发展夜间经济助力。这一点在国际大都市有先进的经验，比如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从2012年起开始设立“夜间市长”，主要职责就是协调消费者、政府、娱乐场所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有效减少了社会负面问题的产生。随后巴黎、马德里、东京等城市也纷纷效仿设立“夜间市长”，使之逐渐成为夜间经济治理的有效手段，打造包容、多元、和谐的夜间环境成为发展夜间经济的保障。

科学规划是实现夜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夜间经济如何布局、运作，如何强化服务，如何加强管理等，都需要纲领性的规划。科学规划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优化上面，比如依托酒吧、商场规划夜间购物餐饮集聚商圈；依托博物馆、美术馆、剧院、画廊等规划夜间经济文化消费集聚区；依托湖滨、河流、海滨等开发大型夜游项目；田野山间环境优雅静谧的地区开发康养项目——科学规划可以实现规划性的市场拓展和产业升级。科学规划的作用还体现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科学设置方面，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效率，还可以预见性地将绿色生态建设纳入考量、预留发展空间。

(2019年28期 人民论坛)

一、全球发展赤字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愈演愈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上升，全球发展赤字有增无减。这种全球发展赤字是全球化负面效应未能得到有效管控，全球发展获益小于成本支出或实际收益不及预期收益，进而制约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状况，其实质是全球发展获益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全球发展赤字主要表现为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一是总量不充裕，欠发展问题突出。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主力军”，发达国家经济繁荣是全球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多数发达国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全球发展总量增长不足。作为全球发展的“低地”，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是全球发展增量的关键。然而，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外，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一些国家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困境。二是质量不高，高质量发展缺失。发展体量与质量是全球发展的一体两面，全球发展总体不充分还表现在全球发展质量不高。一方面，发展方式亟待优化。传统发展方式强调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突出能源、劳动力等生产性要素的作用，造成经济增长低效，无助于全球生态改善。另一方面，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不足。全球发展问题需要各国合作解决，发展成果也应由多数人共享。现阶段，全球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严重不足，以智能手机使用为例，多数发展中国家拥有智能手机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9%），坦桑尼亚仅为13%。

第二，全球发展空间不平衡。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国家间发展鸿沟拉大，发展失衡问题更为突出。一是个体发展不平衡，全球贫富差距扩大。世界银行发布的《国民财富的变化2018》报告显示，高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财富比从1995年的47:1扩大到2014年的51:1，2017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82%；1980年至2016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攫取了全球财富增长总量的27%。与此同时，世界上仍有约2亿年轻人每天生活标准低于2美元，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1987年至2017年，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现象愈加严峻，全球每10人中有7人生活在收入不平等加剧国家。二是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同领域和地区发展失衡加剧。由于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PM2.5（细颗粒物）造成的死亡人数逐年上升。2015年，空气严重污染导致近

650万人患病或死亡，占当年全球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2016年，在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152个国家中有112个“应付了事”，即使是欧洲发展的“领头羊”德国，其内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公民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差距依然明显，东部地区只有6个县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万欧元，西部地区则有284个县市超过这一指标。三是全球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不断拉大。体量较小的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现象。1995年至2014年，世界财富总额从690万亿美元升至1143万亿美元，增长近66%，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财富增长率仅为1%。就财富总额而言，2014年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总额占世界财富的72%，同期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则仅为7%。

第三，全球发展动能不充足。经济发展是全球发展的基本动能，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当前，全球发展赤字也突出表现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动能不足。一是全球经济复苏艰难。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球发展蒙上阴影，经过十余年调整，西方国家经济缓慢回暖，全球发展不确定性依然突出。2020年至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维持在3%左右，全球经济增速进入金融危机以来最缓慢时期。二是全球创新发展停滞不前。创新是引领全球发展的第一动力，全球发展依靠创新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根植于创新能力的提高。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大，全球创新增长面临巨大障碍。首先，创新研发投入比例明显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研发支出的投入比例与国家创新能力呈现正相关性。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2016年至2019年，全球创新研发支出“高投入”趋势明显减弱。其次，“知识霸权”逐渐抬头。创新知识的流动性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知识保护主义抬头，给全球创新网络和创新知识的传播增加阻碍。最后，全球创新鸿沟依然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全球创新鸿沟或将继续加深。三是全球合作发展意愿减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前，在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背景下，国家合作发展意愿减弱，突出体现在经济和生态领域。西方大国内顾倾向严重，美国肆意挑起“贸易战”，严重损伤全球经济发展合作共识。部分西方国家无视环境问题的严峻性，破坏通过艰难谈判达成的全球合作议程。特朗普政府执着于“本国利益第一”，肆意退出各种国际条约、协定，严重损害全球发展的制度基础。

第四，全球发展援助不完善。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成为全球发展的核心议题，“有发

展而无增长”的局面屡见不鲜，全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备受质疑。一是援助有效性不足广泛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发展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援助比例一度达到全球发展援助的90%。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援助项目的实施，受援国不仅没有实现相当水平的发展，甚至出现“越援越贫”现象，全球发展援助的有效性不足。这种经济层面的发展援助降低了非洲产品的出口能力。1970年至1998年是非洲接受官方发展援助的高峰时期，其贫困率从11%增至66%，国际发展援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二是援助不可持续性愈加明显。20世纪80年代，国际援助机构开始关注援助的可持续性问题。发展援助的不可持续被认为是发达国家数量庞大的资源未能在受援国发挥相应作用的重要原因。美国国际发展署评估，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212个教育项目中，仅有22个项目达到可持续性的部分指标。世界银行研究也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550个援助教育项目中，高达50%的项目不可持续。新兴国家参与国际发展援助也出现这种“援助怪圈”，即在援助国人员和物资充裕的情况下，一部分援助项目表现良好，一旦援助国资源离开，项目就逐渐荒废，导致援助效果大打折扣。

第五，全球发展环境不理想。随着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发展环境恶化，国家间、国家与区域集团间非正常关税战频发，贸易保护主义长期化趋势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G20)经济体实施了约1500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特朗普上台伊始便对中国发起所谓“301调查”，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贸易规则之上，严重破坏了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美经贸摩擦久拖不决将导致约4550亿美元损失。美国与欧盟的贸易战则使德国2019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速环比下降0.1%。美国宣布结束对印度普惠制贸易待遇，印度随之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28种产品征收最高达120%的报复性关税。日本与韩国关于电子产品的贸易纠纷不断升级，甚至将对方移出贸易白名单。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产生贸易争端。

二、全球发展赤字的主要原因

全球发展赤字的产生与演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可以从全球化弊端、国家治理失效、发展机制缺陷、发展模式不适和西方个人主义膨胀等五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 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在促进全球发展、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导致发展鸿沟、分配不公、生态破坏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低迷背景下，全球化负面

效应加剧了全球发展赤字问题。一方面，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相对获益问题使得全球发展收益初次分配的差距过大；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博弈与跨国力量相互交织，使得推动全球发展再平衡的政策趋于失灵。

第一，加剧全球发展失衡，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全球化有利于促进全球资源配置，而在全球普遍获益的大背景下，个体之间的相对获益存在差异，拥有技术、资本、人才等发展资源的个体易于凭借优势获得全球化发展主导权和发展收益的大部分。在相对收益悬殊的国际现实下，弱势群体将自身损益归咎于全球化本身，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发酵，增加了全球发展的困难。一是经济发展失衡加剧，全球贫富差距加大。在资本驱动下，全球化过于重视发展总量的增加，忽视了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在全球发展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全球化负面影响被放大，国家间和国家内部发展失衡严重，全球良性发展难以为继。二是生态发展失衡加剧，环境治理形势紧迫。全球化以提高经济利益为重要关切，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当下，以经济发展为重的全球化的盲目性愈加显现，加剧了全球生态环境恶化。三是文化发展失衡加剧，文明冲突被激化。随着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多数国家认识到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但个别西方国家基于经济优势地位和实力影响，散布“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激化了不同文明的矛盾。

第二，加剧全球利益分配不均，国家主义强势回归。作为维持社会公平的主体，国家可通过再分配政策将发展不平衡控制在合理区间。而在全球化负面效应冲击下，跨国力量频频介入，在国内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施加影响，使国内再分配政策难以发挥应有效力，利益调和机制作用递减，社会失衡不断发展，民粹主义势力抬头得势。此外，作为维持全球和平发展的关键力量，国际组织通过国际合作调和国家间利益失衡，积极维护全球可持续发展，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使国家间矛盾冲突趋于表面化、激烈化，损害了全球利益调和机制的效用。面对国际合作式微的现实，狭隘的国家主义强势回归，对全球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贸易保护行为嚣张、国际生态合作受阻、退群废约行为增多等正是全球化负面效应的真实写照。

(二) 国家治理失效的扩散

全球化的最大挑战源于国家政策。有效的国家治理在全球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全球发展的良好前景由各个国家较好地实现发展目标而达成，同时，全球发展产生的问题也经由各个国家扩散，部分国家治理失效、

影响外溢成为全球发展赤字加剧的国内根源。

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治理失效增加全球发展赤字的复杂性。作为全球发展问题的“多发地”，发展中国家治理失效是全球发展赤字加剧的重要因素。随着世界日益成为“命运共同体”，国内治理失效带来的危机和挑战会外溢到世界各地，影响全球发展进程。恐怖主义蔓延、极端贫困难以根除等世界性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失效。这种治理失效使得国际社会推动全球发展的政策内化失效。面对全球风险和全球问题，全球治理主体通过创设发展议程、制定发展规划、提供发展援助等行动，通过国际合作将发展政策内化落实到“问题国家”，促进解决发展赤字问题。但是，发展政策内化不仅需要国际发展援助，更需要特定国家采取相应的治理行动。大量事实表明，部分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全球发展政策内化的失败。

第二，部分发达国家治理失效削弱全球良性发展动能。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主要力量，当前一些发达国家治理体系的适应性不足，治理政策和行为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导致社会冲突和治理矛盾激化，甚至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负担”。一是经济治理失效造成西方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低迷。2008年金融危机给多数发达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经过十多年的恢复与发展，经济增长仍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使得这些国家大规模减少国际发展援助资金，原本就没有达到联合国规定标准的发展援助更加捉襟见肘。二是社会治理失效激化国内矛盾，民粹主义进一步扩散。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发达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减效，制度创新迟缓，贫富差距扩大，逐渐陷入治理危机。经济极化反过来激化社会矛盾，加深政治分歧，助长民粹主义。特朗普竞选成功就是民粹主义抬头的典型表现，其执政后固执坚持“美国第一”原则，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动贸易战，给全球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

（三）现有发展机制的内在缺陷

国际社会已日益融为命运共同体，任何全球风险和全球问题都难以仅仅依靠单个国家解决，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现有全球发展机制存在诸多内在缺陷，缺乏有效凝聚全球合作、破解发展赤字的充分效能。

第一，代表性不足导致合法性缺失。现有全球发展机制多由发达国家主导构建，西方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主导权、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多数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然而，全球发展问题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

现有机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表达渠道。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30%。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背景下，现有全球发展机制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仍由发达国家掌握，全球发展议程难以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引发国际社会对现有发展机制合法性的质疑。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占成员国总数近四分之一，却只拥有5.6%投票权。经过多次改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要机制中投票权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美国始终掌握着一票否决的压倒性权力，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不足。特朗普政府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使其本就备受质疑的合法性基础进一步削弱。

第二，约束性不强制约有效性发挥。随着全球化进程走向深入，全球风险和全球问题日渐增多，更需要国家间协同合作进行治理。国际机制建立的前提是主权国家让渡部分国家权力，其效力的发挥也依赖国家的合作行为。但在国家利益与全球公益的抉择中，国家往往将维护本国利益作为优先选项，忽视国际机制的相关安排，甚至将对抗甚至退出机制作为博弈筹码。同时，多数国际机制在处理成员拒绝遵守相关约定的问题上可采取的应对手段较为单一，国际合作长期处于相对低效状态。例如，在全球发展援助上，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长期达不到联合国规定比例，贫穷国家发展资源紧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单方面退出经过多方努力、共同协商达成的《巴黎协定》，给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恶劣影响。

第三，公平性不够难以形成发展合力。作为决策机制的核心环节，表决制度是国际机制效率提升、发挥作用的关键。现有的全球发展机制多是二战后形成的，建立之初是针对部分欧洲国家，之后扩展到广大发展中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倾听发展中国家声音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而在现有全球发展机制中，关键职位和职能部门大多由发达国家垄断。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际操作中，加权（份额）票具有决定性意义，从而使拥有加权票的发达国家拥有一票否决权，弱小国家的发言权受到极大压制，也不利于解决发展问题的多边合作。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发达国家往往从地缘竞争视角看待发展问题，肆意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发展的政策议程“政治化”，严重损害全球发

展合作共识。

（四）发展模式西方化的逆反效应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认为其发展模式具有普适性，甚至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借助其全球影响力强推西方发展模式。发达国家的全球优势地位和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迫切心理相结合，致使一些国家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事实上，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西方发展模式在全球推广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不仅未能推动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还衍生出许多新的全球发展难题。

第一，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作为西方发展模式的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将这种模式和共识教条地照搬到背景条件迥异的发展中国家，必将导致严重水土不服。20世纪90年代初，深陷经济困局的拉美国家率先接受“华盛顿共识”，相继推行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尽管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初期经历了小幅经济增长，但在世纪之交却陷入经济危机，经济全盘西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失业增加、腐败丛生等社会并发症加剧了国家发展困境。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不到3%，低于“华盛顿共识”实施前年均5%左右的增长率。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曾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休克疗法”，希望通过私有化、自由化实现经济发展，结果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第二，引发严重政治动荡。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将发展模式简单界定为三权分立、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强推所谓“民主模式”，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干预别国政治发展进程，引发严重政治危机。“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使部分中东国家被动地实行表面的国家民主化，给中东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据统计，西方国家推进的“民主运动”，致使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仍处于动荡之中，造成140万人死亡、1500万人沦为难民，以突尼斯为例，其虽建立了所谓民选政府，但国家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2010年以来人均GDP下降了400美元。政治发展模式被动西方化的逆反效应造成中东国家持续动荡，引发全球难民问题、人道主义危机、恐怖主义等问题，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

（五）个人主义在西方的膨胀

个人主义膨胀是西方世界面临的突出难题。作为西方价值观的核心，个人主义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甚至被称为“美国人的第一语言”。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推行

西方价值观，个人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在国际关系领域，托马斯·霍布斯推崇的“丛林法则”堪称个人主义的极端演绎，约翰·洛克提倡的个人主义政治观则成为国际关系自由主义流派的思想渊源。

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全球共同挑战增多，全球发展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共同体意识。而在西方世界，个体利益形成的张力往往割裂全球意识，成为制约国际合作的障碍。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背景下，个体利益矛盾和冲突逐渐增多，在资本推动下，执着于个体利益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个人利己主义、阶层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等个人主义“变体”在全球范围发酵，成为全球发展赤字的思想诱因。

第一，个人利己主义增加了全球发展的社会阻力。在资本逐利性驱使下，个人利己主义极端化倾向明显，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唯一关切，盲目追求个体利益的发展，无视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在全球化进程作用下，这种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在全球扩散蔓延，助推了逆全球化运动，削减了全球发展的社会共识和国家凝聚力。

第二，阶层利己主义危害国内发展秩序。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国家内部突出表现为阶层利己主义。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经过社会分化组合为相应阶层，不同阶层共存于国家统一体中。随着不同阶层的利益矛盾、冲突增多，执着于特定阶层利益的利己主义膨胀，引发极端社会事件，如美国枪击案件频发、英国脱欧争议、法国“黄背心运动”、非洲族群冲突等。社会撕裂引发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加剧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

第三，国家利己主义破坏全球发展进程。全球发展源于国家发展，全球问题的解决也依靠国家间合作。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在国际层面表现为狭隘的国家利己主义。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得势。自由、公正的国际贸易体系是全球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前提。部分西方大国无视贸易自由化的全球利益，片面追求本国短期经济利益，肆意发动贸易战，严重危害了世界经济发展，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二是国际生态合作艰难。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然而，特朗普政府无视气候变化的全球风险，退出《巴黎协定》，拒绝履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义务，缺席有关气候问题国际会议，拒绝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中发言，给全球生态环境合作造成恶劣的示范效应。

三、治理全球发展赤字的中国努力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全球发

展赤字问题也愈加严峻。“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目前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其实，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生长乏力、动能不足、生态失衡、贫困问题等难题，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发生或正在应对和治理中，中国发展本身也是在不断解决各种问题中砥砺前行。中国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和经验治理发展赤字，为国际社会应对发展挑战作出更大贡献。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发展共识

面对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全球性挑战，面对利己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的肆虐和国家主义的强势回归，中国倡导世界各国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开展全球性发展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创新全球发展理念，夯实合作发展的思想基础。面对复杂的全球发展形势，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一系列推动全球发展的新观点。一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共商”强调治理主体的平等性，就是以平等协商的理念增强治理行为的可行性和透明性。“共建”突出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就是以开放包容的理念打破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形成推动发展的治理合力。“共享”体现治理目标的互利性，就是以合作共赢的理念打造公正普惠的全球发展格局。二是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发展观。以创新发展增强合作动力，为破解全球经济发展困局开出中国药方。以开放发展扩展合作空间，坚持倡导自由贸易体系，致力构建多边贸易体制，以开放的胸怀提振全球发展信心。以联动发展深化合作共识，形成利益共赢的全球经济发展联动体系，实现共同发展。以包容发展增强可持续性，以全球合力缩小国家间发展差距，增强全球发展的共享性和普惠性。三是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新型义利观。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以正确义利观凝聚发展共识。坚持“以义为先”，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无理行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义利兼顾”，推动国际关系朝着双赢、多赢、共赢的方向发展，用国际合作发展的“公利”巩固共同体意识，构建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

第二，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凝聚和平发展的国际共识。面对西方根深蒂固的零和冷战思维，中国提出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通过对话协商管控矛盾，依托合作实现共赢，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心聚力。首先，以“相互尊重”反对强权思维，

用平等性和包容性指导国际关系基本实践，反对霸权行为，筑牢国际合作的思想根基。其次，以“公平正义”强调国际交往的公义性，以公平突出平等，以正义促进法治。最后，以“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发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反对零和博弈，实现共建共享。党的十九大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一步阐明了新型国际关系的要义，为全球良性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第三，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筑牢共同发展的合作根基。中国已与世界上11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60对，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打造了遍及全球的“朋友圈”。根据双边合作的紧密程度，伙伴关系网络可分为“友好”“合作”“战略”三个层次。其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堪称双边伙伴关系的典范。根据地域范围划分，伙伴关系网络由地区和国际两个层次组成，地区层次的伙伴关系主要包括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非战略伙伴关系等。通过构建伙伴关系，协调推进与不同类型国家关系全面发展，扩大各方利益交汇点，不断增进团结合作，巩固壮大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

第四，打造双边多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包容发展的全球意识。中国积极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步形成辐射全球的命运共同体网络。首先，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愈加稳固。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大周边与小周边统一谋划，中朝、中缅、中柬命运共同体日益紧密。其次，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焕发生机。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中巴、中非、中拉、中阿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最后，大国命运共同体逐渐成形。大国是国际合作的关键，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积极发展同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等大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大国合作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

（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激发全球发展动能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巨大、全球持续发展动能严重不足的现实，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全球发展增添新动力新能量。多年的建设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

第一，“共商共建共享”打造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

作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基本方式，国际合作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碎片化的全球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始终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把“共商共建共享”作为发展合作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坚持打造开放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中国迄今已同15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173份合作协议，“一带一路”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2013年至2018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6.469万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4.4万个就业岗位，有力促进了沿线国家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能够为超过30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提供帮助。

第二，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将创新驱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打造富有活力的“创新之路”。一是创新合作网络日益完善。中央部委完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着力对口援助，社会力量开展民间合作，多层次、宽领域、多主体的创新合作网络不断充实。成立“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出台“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联合研究成为“一带一路”创新合作的重要方式。二是创新合作项目落地生根。作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科技园区合作促进了沿线国家间科技创新交流和技术对接。目前，“一带一路”国家级科技合作基地超过700家，8个国家级科技园区正在稳步推进，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孵化中心遍地开花。三是创新合作交流紧密。通过留学生、科学家短期科研、发展中国家技术培训班、国际杰出青年计划等人文交流计划，为沿线国家培养创新型人才。

第三，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包容的发展模式。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中国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落实，始终贯穿开放包容理念。一是准入门槛开放，不以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为限，没有任何附加条件，表现出鲜明的开放特征。二是议程设置包容，以“战略对接”为主要抓手，无论国家大小、社会制度如何，通过开放性协商都能达成适合的发展议程。三是贸易投资便利，以“五通”为主要内容，坚定支持自由贸易体制，通过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将使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增加4.1%，全球和“一带一路”经济体贸易额增幅有望分别达到6.2%和9.7%。

（三）促进发展机制改革，提升全球发展效能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国际发展机制仍以西方为重心，少数西方大国把持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性严重不足。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发展机制民主化、公平化进程，助力破解全球发展机制困境。

第一，推动现有发展机制改革。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发展机制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增强现行发展机制的适应性，更好地推动全球发展。中国主张在现行发展机制框架内，通过相应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提升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发展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初，中国就多次呼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结构进行必要改革。2010年，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合力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改革方案，促使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性。

第二，创设全球发展新机制。面对世界发展不平衡加剧，中国积极推动创设区域乃至全球发展新机制。一是引领金砖机制发展。作为新兴经济体对话协商的重要平台，金砖机制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金砖机制的创始成员国，坚定支持金砖机制化进程，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厦门峰会提出“金砖+”合作模式，拓展了金砖合作的全球朋友圈，开启了金砖合作的第二个“金色十年”。二是建立多边金融机构。资金融通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战后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由发达国家主导，带有明显的不公平和工具性特征，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实际需求。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融资难的现实问题，为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

第三，深化不同机制合作。随着全球发展机制增加，机制碎片化倾向明显，机制间功能重叠、竞争加剧等现象降低了机制效能。中国积极充当桥梁和纽带，促进弥合机制分歧，推动不同机制合作。一是以机制协商实现合作发展。近年来，中国促成金砖峰会与G20峰会平行举行、推动金砖机制与欧盟相关机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与“一带一路”协同发展，通过加强不同机制沟通协商，实现机制功能最大化。二是以机制互补实现合作发展。面对功能重叠问题，中国强调新老发展机制可以通过机制互补实现共同发展。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着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补充了亚洲开发银行在基建领域的弱势。三是以机制对接实现合作发展。不同发展机制的具体形式可能不同，但实质都是促进地区发展与稳定。中国倡导通过机制对接，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

倡议下中国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对于加强国家间合作意义重大。

（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增强全球治理能力

全球发展赤字是国家治理失效的外化和表现。国家治理失效或产生发展问题外溢为全球问题，或导致解决发展问题的全球合力内化失败，使得全球发展治理更加艰难。因此，全球发展赤字的根源在于国家治理失效，其有效治理也有赖于国家治理。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有效解决国内发展矛盾的同时，也为全球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一是以政府治理现代化提高行政效能。政府治理能力决定国家治理效能的发挥，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作用突出。一方面，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政府治理模式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治理目标从“管理一切”到“管得好”转变。十八大以来，中国各级政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国家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忽略任何一个领域都可能给国家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中国政府以职责体系科学化、合理化为核心，坚持政府职能的动态协调，促进了国家良性发展。进入新时期，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态势，中国政府把生态环境保护置于政府履职的关键位置，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乃至全球发展营造了良好国际环境。

二是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化解利益矛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治理以人民为中心，从具体国情出发不断调适治理模式，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表现为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多元性。在治理主体上，坚持政府主导为前提，积极调动社会主体治理积极性，引导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治理方式上，综合运用法治、德治和自治三种手段，实现治理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高效化。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夯实“法治”根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德治功效。深入推进基层自治，走好社会治理的“最后一步”。

三是以全球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全球发展合力。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对于治理全球发展赤字至关重要。全球治理能力主要是为有效解决全球问题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素质和技能，具体表现在硬能力、软能力和巧能

力三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治理硬能力大大增强。中国也高度重视软能力建设，通过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方案，有力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以中国经验和智慧为引领，积极为全球经济治理、减贫合作、反腐合作等贡献智慧，不断提升全球治理巧能力。

（五）加强国际对话交流，分享中国发展经验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工业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中国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蕴含的东方经验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借鉴。与西方国家强推自身发展模式不同，中国不“输出”模式，也不要求别国“复制”中国做法，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共同治理全球发展赤字。

第一，在合作共建中分享发展理念。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一系列发展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在合作共建具体项目中与国际社会分享。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人民是国家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二是渐进探索的发展理念。“摸着石头过河”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启示，试验园区建设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坚持“试验——推广”探索式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三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始终坚持成员的平等性、过程的参与性和结果的公平性。

第二，在交往互动中交流发展经验。近年来，中国通过举办论坛、博览会等方式，积极向谋求发展的国家分享经验。一是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包括参与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成立十九大精神对外宣讲团、出版《谈治国理政》外文版等交流活动。以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为例，中国积极倡导并参与相关会议讨论，并将其作为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配套活动，为相关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创造新平台。二是政党建设经验交流，包括举办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大会、中国—中东欧政党对话会、中缅政党对话会、中美政党对话会等交流活动，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以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大会为例，近300个政党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大会，讨论政党发展、国家建设的经验。三是合

（下接第7页）

“十四五”时期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的方向

面对疫情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多方面挑战，如何以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如何推进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的突破？如何应对挑战并赢得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7月17日下午，在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在线改革形势分析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发表演讲认为，“十四五”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外部环境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因此要按照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好对接国际规则和标准，使生产要素的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都更加顺畅。



“十四五”时期内外环境变化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出紧迫要求

“十四五”时期区别于以往的五年规划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外部环境的“百年未有之变局”。大变局的“变”既表现为生产力层面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表现为生产关系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政治格局调整。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改变传统生产要素和新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将相对下降，而技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的重要

性将大幅提升，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数据规模、数据加工能力、数据治理体系正在成为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全球治理体系将加快重构，国际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美国在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不断对我发难，并推动与我国经济“脱钩”。

因此，我们要抵御风险挑战，就必须建设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并与国际市场对接，既要畅通国内大市场循环，又要促进形成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总之，要从外部环境的大变局中认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意义。

“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将继续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因素的多重制约

从国内看，“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将继续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因素的多重制约，制造业大规模扩张阶段将要结束，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深刻变化，创新能力不足进一步凸显，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加快，储蓄率随着抚养比上升而趋势性下降，资本积累速度将逐步放缓。随着越来越接近国际技术前沿，可模仿学习空间越来越少，加上美西方的技术封锁，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难度增大，这对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提出更加紧迫的要求。

无论从外部环境变化，还是从国内发展阶段性特征看，都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造成的，关键是有利于释放增长潜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扭曲，要素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近年来虽有所回升，但仍不到2%。根据美国宾

夕法尼亚大学“佩恩表”数据库 9.0 版，2014 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 43% 的水平。日本和韩国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和经济增速“下台阶”的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达到美国 80% 和 60% 的水平。如果我国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全要素生产率要达到韩国的水平，也就是相当于美国的 60% 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就要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提高。若设定美国 2015-2035 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为 1%，那么 2015-2035 年期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达到 2.7%，才能在 2035 年达到美国 60% 左右的水平。如果今后 15 年经济年均增速由过去两年略高于 6% 进一步下降至 5% 左右，那么全要素要达到 2.7% 的年均增速，则意味着其对经济增长贡献要在 50% 以上。从以往经验看，这并非易事。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关键。

“十四五”时期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突出重点、分类推进

“十四五”时期，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突出重点，分类推进。通过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释放经济增长潜能。传统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把劳动力、土地、金融资源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领域，使经济达到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

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重在推进劳动力城乡流动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四五”时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还要突出一个重点领域，就是促进人才的社会性流动和高端人才市场培育。关键是要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构建人才的社会性流动和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体制机制，加快与国际人力资源市场的对接，增强对全球一流人才的吸引力。

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十四五”时期，除了继续放开金融服务业市场准入，增加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外，需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内涵，注册制改革要在科创板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为新经济公司提供更便利快捷的上市渠道，也为承接中概股回归创造条件。当前，国际上负利率低利率盛行，流动性充裕，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将会对吸引国际投资和资金流入起到重要作用。

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要探索扩大土地使用权入市的用途，从目前试点情况看，入市后可以用作工矿仓储、商业服务等，但考虑到集体经济组织自我开发的能力有限，可考虑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出让的方式用于建设租赁住房乃至共有产权房。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在落实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户资格权的基础上，关键是拓展使用权向外部人员流转的空间，优先扩大农民住房财产权对外流转的空间，稳步扩大宅基地使用权对外流转的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理流动。

在新生产要素领域，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先进技术扩散，使我国的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以释放仍然存在的追赶潜能。这就要求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特别是体制内职务科技成果的产权界定不清晰，以及数据的产权界定规则尚未建立，我国的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正在成为国际竞争制高点的背景下，加快培育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尤为迫切。

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在探索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改革。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强、科技人员创新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关键是产权激励不到位。要探索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开展赋予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让科技项目研发与科技人员受益直接挂钩，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科技供给质量和效率。加快发展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支持高校、科研机构 and 科技企业设立技术转移部门，对培育发展技术市场也十分重要。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在数据产权界定和数据交易市场培育。由于数据产权尚未清晰界定，数据的归属不明确，这就无法形成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数据无法正常交易就会导致数据非法交易泛滥等问题。要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进行规范。在数据确权基础上，在市场定价机制、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监管上形成规范性制度和规则，加快培育数据交易市场，并与国际数据市场对接。

综上所述，“十四五”时期，要按照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更好对接国际规则 and 标准，使生产要素的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国内双循环都更加顺畅。 (2020-7-22 思客)